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朱玉麒 主编

- 关于鸠摩罗什札记 伯希和 撰；富安敦 整理；张广达 等译
克孜尔石窟谷西区第39窟现存龟兹语及其他 新疆龟兹研究院
婆罗谜文题记简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库车、锡克沁壁画题记 荻原裕敏
吐火罗语与《弥勒会见记》研究新猷
——评介 *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und die alttürkische Maitrisimit* 庆昭蓉
俄藏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译注 张铁山
- 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陀龟符”初探 孟宪实
从高昌到西州
——中古吐鲁番佛教寺院社会功能的转变 姚崇新
丝绸之路与高昌经济——以高昌国的银钱使用与流通为中心 裴成国
杨志烈之死——安史乱后的河西失陷与北庭隔绝 刘子凡
- 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四件经济文书 毕波 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吐蕃统治时期于阗的行政区划 朱丽双
吐蕃统治时期于阗的职官 沈琛
- 伊朗史诗《库什王纪》所载古代中国地理信息刍议 刘英军
斯卡奇科夫收集品中的瑰宝（二篇） 李福清 索洛米娜 撰；杨军涛 译
文化视阈中的伊犁将军松筠研究 史国强
《奇台县乡土志》考略 夏国强
- 中国内地会新疆传教士巴富义传记及其史料价值 蒋小莉
黄文弼：中国新疆考古的先驱 郑智明 撰；蒋小莉 译
“重走黄文弼西北考古之路”行程日志·2015 吴华峰

西域文史

【第十辑】

口
著
者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西域文史

(第十辑)

朱玉麒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西域文史》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合出的学术论集,本辑发表与西域相关的学术论文19篇,内容涉及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学术史等方面。

本书适合于从事西域考古、语言、历史、文学、民族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文史.第十辑/朱玉麒主编.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3-048069-9

I. ①西… II. ①朱… III. ①文史资料-西域 IV. ①K294.5②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3783号

责任编辑:孙 莉 郝莎莎/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肖 兴/封面设计:邱 炯 陈 敬

封面题签:冯其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1/4 插页:2

字数:533 000

定价:1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Studies of Literature & History on the Western Region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Vol. X

Zhu Yuqi Editor-in-Chief

Science Press

Beijing

《西域文史》编委会

主 编 朱玉麒

编 委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
陈开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贾丛江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李 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刘安志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罗 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孟 楠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施新荣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王 欣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王冀青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启涛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乌云毕力格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姚崇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于志勇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余 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铭心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赵 莉 (新疆龟兹研究院)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英文编审 王媛媛 蒋小莉

目 录

关于鸠摩罗什札记	伯希和 撰; 富安敦 整理; 张广达 等 译 (1)
克孜尔石窟谷西区第39窟现存龟兹语及其他婆罗谜文题记简报	新疆龟兹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15)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库车、锡克沁壁画题记	荻原裕敏 (33)
吐火罗语与《弥勒会见记》研究新猷 ——评介 <i>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und die alttürkische Maitrisimit</i>	庆昭蓉 (43)
俄藏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译注	张铁山 (67)
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	孟宪实 (81)
从高昌到西州——中古吐鲁番佛教寺院社会功能的转变	姚崇新 (93)
丝绸之路与高昌经济——以高昌国的银钱使用与流通为中心	裴成国 (127)
杨志烈之死——安史乱后的河西失陷与北庭隔绝	刘子凡 (171)
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四件经济文书	毕 波 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187)
吐蕃统治时期于阗的行政区划	朱丽双 (201)
吐蕃统治时期于阗的职官	沈 琛 (215)
伊朗史诗《库什王纪》所载古代中国地理信息刍议	刘英军 (233)
斯卡奇科夫收集品中的瑰宝(二篇)	李福清 索洛米娜 撰; 杨军涛 译 (253)
文化视阈中的伊犁将军松筠研究	史国强 (279)
《奇台县乡土志》考略	夏国强 (293)
中国内地会新疆传教士巴富义传记及其史料价值	蒋小莉 (309)
黄文弼: 中国新疆考古的先驱	郑智明 撰; 蒋小莉 译 (319)
“重走黄文弼西北考古之路”行程日志·2015	吴华峰 (329)
《西域文史》第十辑著译者单位及文章索引	(357)
《西域文史》简介与稿约	(358)

Contents

Notes sur Kumārajīva	Paul Pelliot (ed. Antonio Forte, tr. Zhang Guangda, etc.) (1)
A Brief Report on the Kuchean and Other Inscriptions in Brāhmī Script Presently Surviving in the Cave 39, Kizil Grottoes	Kucha Academy of Xinjiang;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5)
Captions on the Murals from Kucha and Shorchuk Housed in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Ogihara Hirotoshi (33)
Progress on the Studies of the Tocharian Languages and the <i>Maitrisimit</i> : Introduction and Remarks to <i>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und die alttürkische Maitrisimit</i>	Ching Chao-jung (43)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Old Uighur “xuastuanift” Collected in Russia	Zhang Tieshan (67)
A Study on the “Shi Shatuo Tortoise Tally” Unearthed from Suyab of the Tang Dynasty	Meng Xianshi (81)
From Gaochang Kingdom to Xizhou Prefec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Func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in Medieval Turpan	Yao Chongxin (93)
The Ancient Silk Road and the Economy of Gaochang King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age and Circulation of Silver Coins under the Gaochang	Pei Chengguo (127)
The Death of Yang Zhilie: Situations of Hexi and Beiting after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Liu Zifan (171)
Four Sogdian Economic Documents from Khotan	Bi Bo & Nicholas Sims-Williams (187)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Tibetan-ruled Khotan	Zhu Lishuang (201)
Studies on the Bureaucratic Establishment of Khotan during Tibetan Rule	Shen Chen (215)

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on Ancient China Contained in the Iranian Epic <i>Kūshnāma</i>	Liu Yingjun (233)
Treasures in Konstantin Skachkov's Collection (Two treatises).....	
.....Boris L. Riftin & Olga L. Solomina(tr. Yang Juntao) (253)	
A Study on Yili General Songy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Shi Guoqiang (279)	
A Brief Survey of <i>Qitai Local Records</i>	Xia Guoqiang (293)
 <i>To What Purpose</i> and Missionary Work of CIM in Xinjiang.....	Jiang Xiaoli (309)
Huang Wenbi: Pioneer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Xinjiang.....	
.....Justin Jacobs(tr. Jiang Xiaoli) (319)	
Travel Diary 2015 : Revisiting the Northwest China Expedition Route of Huang Wenbi	Wu Huafeng (329)
 Contributors	(357)
<i>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i> Notice to Contributors	(359)

关于鸠摩罗什札记

伯希和 撰；富安敦 整理；张广达 庆昭蓉 汪 娟 译

富安敦题注：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Paul Pelliot）手稿第220号。手稿原题作“D^r Johannes Nobel, Kumārajīva (*Sitzungsber. d. Pr. Akad. d. Wissensch.*, 1927, 206-233)”。参见Johannes Nobel, “Kumārajīva”,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lin. 1927, pp. 206-233。刊布本手稿，我遵循先前刊布伯希和《西安府景教碑》（*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Epigraphical Series 2] and Collège de France, Kyoto and Paris, 1996）一书凡例。手稿页边有铅笔加注，通常不易识读，我只有在涉及更改正文时才斟酌采用。感谢 Françoise Bottéro，她校阅了最后印刷清样，没有她的宝贵帮助，本手稿是不可能刊出的。

鸠摩罗什（344—413）其人主宰着5世纪初中国佛教的翻译界。这位祖先为天竺人的僧人，出生在中国西域的龟兹，母亲是龟兹王妹。鸠摩罗什很早就被母亲带往罽宾，其后居留在沙勒。他在沙勒从小乘转到大乘，其后返回龟兹，若干年间理当在龟兹起着一流角色的作用。385年顷，他终于被带往中国，经历了河西地区的几个朝代，而后来到{都于}长安之前秦。在许多弟子的协助下，他为这些朝廷翻译了佛典“三百余卷”，其大部分现今仍见存于大藏经中。艾约瑟（Edkins）、南条记述鸠摩罗什有不少疏忽误会之处，烈维（Sylvain Lévi）和我本人对此已有所纠正。但是，519年成书的《高僧传》卷二所收《鸠摩罗什传》仍然有待全文翻译^①。Nobel先生以《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本文对勘《晋书》卷九五的相应传文^②，非常胜任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①（手稿注1）烈维先生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 1913, II., 335—338页）业已概述此传{译按：该文即《“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考》，以下译文径换之}。此外，此传在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1926年博士论文《中国的佛教经藏》（*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 178—184页）也译出大部分，然而Nobel先生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此书直到1927年夏天才刊行问世。师觉月先生虽然加了引号来表示引用正文，实际上是一种调适，其中有时加入未见于《高僧传》的材料，还有许多刊印错误；不过文中也可以见到许多有用的评注与校勘。

②（手稿注1a）Nobel先生在他的导论中也引用了《出三藏记集》卷一四所收传记。并且他（烈维、师觉月两位先生也是一样）误认为这篇传记比《高僧传》所载更加浓缩，而且同样源自同一种文本。遗憾的是Nobel先生未能观察得更仔细一些，因为这两种文本之间有些重要的歧异，而成书略早于《高僧传》几年（而不是如烈维先生所说的略晚）的《出三藏记集》里含有《高僧传》阙载的若干记述。《出三藏记集》在515年应已撰成，关于这个年代，参见我在《通报》（*Toung Pao*, 1920年，266—268页）所刊的讨论。{译按：此指《通报》第XIX卷（1918年份，1920年发行）之《牟子理惑论》（*Meou-Tseu ou les doutes levés*），255—

他的译文总体上很正确,文中注释则证明他熟稔佛教专门语汇^③。

402年伊始^④,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后秦姚兴身旁。姚兴狂热崇尚佛法,让“八百

286页,非指《通报》第XX卷,1920年,183—274页之书评论文《中国皇帝的征略》(L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开元释教录》的编纂者在卷四编撰鸠摩罗什传记时的取材,较偏重于《出三藏记集》,而不是《高僧传》。

- ③ (手稿注1b)一些详细提示。209页:Nobel先生文注4从730年编纂的《开元释教录》所引用的那句话,自6世纪之初即已见于《出三藏记集》中的传记。210页:“首先作为他的配偶”(Erst als ihr Gatte)。原文之下敕者意指国王而不是配偶。211页(两次)与212页:Nobel先生在原文为“沙弥”(śrāmaṇera)之处皆写成“沙门”(śramaṇa),而鸠摩罗什只是在更晚的时候才受具足戒的。211页:“与”字应作“优”字。213页:不管正文如何舛谬(由于“车”字误抄成“军”,导致冗出实际并不存在的官号“参军”)。文本指的当是“莎车王的两位王子”而不是“莎车王”自己,这点看来没什么疑问。}译按:《高僧传》作:“时有莎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委国请从而为沙门。兄字须利耶跋陀,弟字须利耶苏摩。”(《大正藏》五〇,330页)他本中“莎车”或作“草车”。}人们可以注意到根据《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与须利耶苏摩(Sūryasoma)交往的所在地是龟兹,而不是莎车,详下文。我现在无缘得见Péri在}《关于世亲之年代》(À propos de la date de Vasubandhu),}《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E.F.E.O.,第十一卷,373页注3与376页)所引述的原文。}译按:检Péri所引资料仅云为“《法华经传记》”,相当《大正藏》所收《法华传记》卷二的释僧肇《法华翻经后记》:“弘始八年夏……什曰:……时遍游五竺,寻讨大乘,从大师须利耶苏摩浪禀理味,殷殷付嘱梵本言:‘佛日西入,遗耀将及东北。兹典有缘于东北,汝慎传弘。昔婆藟盘豆论师制作《优婆提舍》,是其正本。莫取舍其句偈,莫取舍其真文。’予忽忽忝承之,负笈来到。”(《大正藏》五一,54页)}214页:Nobel先生看来相信“温宿”乃“Akṣu”一名的转写,但这不大可能,另参}《库车、阿克苏与乌什一吐鲁番古名札记》(Note sur les anciens noms de Kučā, d'Aqsu et d'Uč-Turfan)}《通报》1923年131—132页。214页:我不知道Nobel先生从哪里得来“阿伽耶末帝”的读法,我所知道的文本都写成“……竭……”,并且“竭”字在古代的齿音收声并不利于将它复原为“Akāyamati”。217页:应该指出名僧道安,他是一位经藏目录的作者。218页:译文添加的词语“其军队(die Truppen des)”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道理;带走两个王子的,被认为是吕光。220页:“比日”意为“连续几天”,而不是“先前”。221页:陇西王“硕德”,应补充其姓为“[姚]硕德”。姚秦史上经常提及此人。223页:“常山公显”即见于228页注1的姚显。僧叡《自在王经后序》(《出三藏记集》卷八)提到的即是此人,亦见《晋书》卷一一七,4叶下;卷一一八,1叶上、2叶下,也见于《高僧传》卷六《道恒传》。“安成侯[姚]嵩”不仅见于225页,也见于231页;他还见于《晋书》卷一一八,3叶上以及《高僧传》卷六《慧远传》。Nobel先生据《丽》本误为“左军将军”,其他}大藏经}版本仅有“左将军”一个称号,这也是姚秦时期真实的官号,参见《晋书》卷一一八,3叶上。}译按:此处Nobel介绍的原文是《高僧传》卷二“乃著《通三世论》,以勘示因果,王公已下,并钦赞厥风。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军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大正藏》五〇,332页)。其中“左军将军”的第一个“军”字仅见《丽》本,《宋》《元》《明》《宫》本俱无。}关于姚嵩的片断记载,保存在《广弘明集》卷一八。223—224页:《出三藏记集》中就鸠摩罗什的译经目录,提供了若干值得讨论的异说。224页:“来自Lang-kuang的道生”(Tao-sheng aus Lang-kuang)应作“来自龙光[寺]的道生”。这位道生(434年歿)参见《高僧传》卷七之该僧传记,以及《广弘明集》卷二三之该僧谏文。225页:法和见《高僧传》卷五之该僧传记。相传鸠摩罗什题赠给他的那首诗,与《出三藏记集》中的文字略有出入。}译按:《记集》作“心山育德熏,流芳万由旬。哀鸾鸣孤桐,清响彻九天。”(《大正藏》五五,101页)而《高僧传》作“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大正藏》五〇,332页)}226页:注3看来是无心之失。《晋书》写的也是“十”。230页:这位“勒比丘”有可能是位名叫Ratna的比丘(抑或Pārśva,假设勒=助——参见烈维)。同样地,常见的禅宗祖师宗记所伪称的“鹤勒那尊者”(le pseudo-Haklenayaśas(!))有可能是一位名叫Ratnayaśas的僧侣;又有Ratna[mati]写成勒那,参见《关于世亲之年代》,368页。231页:法和不是天竺人,他只是继承其师道统而冠竺姓,参见南条目录,附录II,23页。

- ④ (手稿注2)关于关内、河西地区在“十六国”时期的各个政权}译按:原文作princes“王子、公侯”},Nobel先生予以明确系年,但与此前P. Tschang的Synchronismes chinois或者M. Giles的Biographical Dictionary相比——它们彼此偶尔分歧——亦不必固以Nobel先生系年为准。关于这些“篡位者”的政权年号,各种异说之间产生了一年,有时甚至于两年的差距,而现存伪史《十六国春秋》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我无法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余名僧人”听他演说经义并协助他翻译经文。Nobel先生依据《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和《晋书》相应传文而了解这一情节，但是没有注意到相关记载亦见于《晋书》卷一一七（4叶下—5叶上）的《姚兴载记》。姚兴与鸠摩罗什曾在逍遥园澄玄堂讨论佛经本文。《姚兴载记》提到八百僧人参与考校经文的工作，而我稍后将讨论这段文字。

《姚兴载记》还增加了不见于鸠摩罗什以上两传的如下词句：“[姚兴]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姚兴载记》中关于八百僧人的段落。Nobel先生翻译的《高僧传》文本（222页）说，支竺译者所出的旧译经义多有乖谬^⑤，与原始的“梵语”（sanskrit）本不相相应；于是鸠摩罗什持“梵语（sanskrit）”本，姚兴执旧经，共同重勘《大般若波罗密多》（Mahāprajñāpāmitāra）。然而，上文中两处“梵本”的“梵”字，宋刊藏经均作“胡”。《出三藏记集》在高丽藏和宋藏的相应段落亦皆作“胡”，“梵”字只见于元藏刊本和明藏刊本。“胡”字在汉代指蒙古乃至东蒙古的民族，其后，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胡”字用来指东西突厥斯坦以及印度文化圈——这也是过去人们认知中亚的方式——的民族和语言；在唐代，它被限于指称突厥斯坦地区的族群，不管是伊朗人或“说吐火罗语的人”（“Tokhariens”），而印度专称为“梵”，亦即Brahma之国度，而sanskrit被称为“梵”语。一旦这一区别被确定下来，人们便相当频繁地把旧译中用来称呼天竺文本的“胡”改回为“梵”。然而，宋藏并不是在这两个段落中使用“胡”而不用“梵”字的唯一刊本，《晋书》《姚兴载记》相应处用法亦然。《晋书》撰成于7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直接取材于慧皎《高僧传》，它与宋藏用法一致，足以断定慧皎写的是“胡”而不是“梵”。我们即将看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而两者至少能够部分地追溯到今天已经亡佚的，更早的共同史源。而那共同史源无论如何一定作“胡”，因为我们往往把“梵”改回为“胡”，而相反的情况尚未发生^⑥。宋藏的写法足以表明慧皎《高僧传》大概就已经是这么写的。总之，我相信，作为通例，在大藏经诸多刊本游移于“胡”“梵”之间的纷纭情况中，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考虑，最初的文本应当作“胡”。

《姚兴载记》还有一方面颇富旨趣，即留下了与鸠摩罗什业绩有连带关系的僧人

⑤（手稿注3）“支竺”即“月支”与“天竺”之略。人们知道，尽管月氏一族名称的正确写法始终是“月氏”（这可以在《鸠摩罗什传》中发现，见Nobel文211页），“月氏”与“天竺”成为姓氏时，总是简写成“支”与“竺”。Nobel先生将“支”改成“天”的建议（222页注2）应予抛弃，因为“支竺”一语在《出三藏记集》还另有出现。译按：《出三藏记集》卷八《维摩诘经序》、卷一五《慧远传》亦有之。

⑥译按：这里的“因为我们往往把‘梵’改回为‘胡’”与本段稍前的“人们便相当频繁地把旧译中用来称呼天竺文本的‘胡’改回为‘梵’”乍看之下自相矛盾。然而寻绎其文意，可以理解前面伯希和说的是唐代前后的人们改“胡”为“梵”，后面是说后代学者在理清文本与译经用语的来龙去脉之后，又得以将“梵”校改或者在心中复原为“胡”。其理路仍然清晰，只是此稿曾在伯氏生前付梓，这两句遣词用字想必会有所斟酌改善。又，关于“胡”“梵”用法争议，历来学者考释颇多，其中Daniel Boucher提出“胡本”原则上当表示佉卢文本，“梵本”当表示婆罗谜文本，流响甚广，参见该氏“On Hu and Fan Again: The Transmission of ‘Barbarian’ Manuscripts to Chi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23, Number 1, 2000, pp. 7-28, 此不赘。

名字。《高僧传》之《鸠摩罗什传》列举（Nobel文222页）僧𪛗^⑦、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和僧肇。《晋书》〔卷九五，15叶下〕相应之罗什传文仅举出僧叡和僧肇^⑧。相反，《晋书》之《姚兴载记》（卷一一七，4叶下）举出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坦、僧肇和昙顺。我们如果重检这几份名单，就会察觉这些人都是名僧。第一个僧名在两份名单中尽管写法上有出入，但是同为一入。“𪛗”和“略”同音，《诗经》中“𪛗”作“略”。僧𪛗是中国世俗权力设置的首任“僧主”，415年顷卒于长安，春秋七十（《高僧传》卷六）。僧迁和法钦则是在当时僧官制建立的时刻出任为僧𪛗的副手^⑨。道流之名再现于僧叡《大品经（Mahāprajñāpāmitāra）序》，见《出三藏记集》卷八。道恒即《晋书》中更名为道坦者，346—417年在世（《高僧传》卷六），他的生涯与道标密切纠结在一起，后者在《晋书》中改为道树^⑩。Nobel先生（229—233页）译出《僧叡传》，可是他误以为该人就是《鸠摩罗什传》后半提到的一位僧人（224页）。实际上《鸠摩罗什传》后半所指的僧人名字叫慧叡^⑪。僧肇是著名作家（参看南条《目录》，附录II，注2），《高僧传》（卷六末）称他死于414年，得年三十，这个年龄看来不实^⑫。以上是《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提供的名单。相反地，《姚兴载记》文本略去了《高僧传》的若干名僧，但举出了《高僧传》中没有列出的昙顺之名。昙顺不太有名，但《高僧传》卷六《道祖传》中插入了一句话，告诉我们昙顺少年时受业于鸠摩罗什。看来情况不太可能是昙顺之名曾被慧皎录入《鸠摩罗什传》而后来失落；不过，凡是熟悉中国撰述家习惯的人也都明白，《晋书》的编撰者更加不可能在他们照录的名单之外还去另寻此人的名字。这导出《晋书》的《姚兴载记》虽然提供了与《高僧传》非常接近的名单，但《姚兴载记》直接或间接地取材的，并非

⑦ （手稿注4）东京小字刊版之第一字作“增”，这纯是刊误。〔译按：此指《大正藏》而言，见《大正藏》五〇，332页。〕

⑧ 〔译按：此句中“僧肇”与“《晋书》”间有一左括号，其后长达一页的段落未见相应之右括号。寻其文意，疑其右括号当置于本句句末。〕

⑨ 〔译按：僧迁为悦众，法钦掌僧录。并见《高僧传·僧𪛗传》。〕

⑩ （手稿注5）这道异文可以由六朝与唐代时常将“标”写成“𣪠”的习惯来解释。《出三藏记集》卷一〇抄录了道标所写的一篇序。〔译按：即道标《舍利弗阿毘昙序》，载《大正藏》五五，70—71页。〕

⑪ （手稿注6）僧叡仅见《丽》本，其他版本均作慧叡；相反地，在《出三藏记集》相应段落中，却反而是《丽》本作慧叡，其他版本作僧叡。但慧叡为《晋书》（卷九五，15叶下）所证实。此僧即是在5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亡故的僧人慧叡，享年足岁八十四；《高僧传》卷七所载此僧传记证明他与鸠摩罗什的关系，并且既然他曾旅行印度并学习梵语，鸠摩罗什会与他切磋印度语法与写作风格方面的精义也是相当自然的。亦参见《出三藏记集》卷一五《道生传》关于慧叡的记述。

⑫ （手稿注7）设若僧肇生于384年，他便不能如其传记所云，于二十岁时赴姑臧（即河西的肃州或凉州）见鸠摩罗什。〔译按：指《高僧传》卷六《僧肇传》等文指肇“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时竞誉之徒，莫不猜其早达。……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因为鸠摩罗什于398年抵姑臧，三年后便离开，并且根据所有关于他的传记，什于402年初抵达长安。但这个误差——如果其中确实有误——看来也不过是几年；而且僧肇死时顶多三十五岁。关于僧肇著作，参见〔《关于〈道德经〉的一份梵语译文》（Autour d'une traduction sanscrite du Tao Tō King）〕《通报》，1912年，392页（那里僧肇的拼法Seng-tchao误为Seng-tch'ao）。

《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而是另一种《鸠摩罗什传》^⑬。

上述情况的确定，导致我们重新考虑另一个问题，而我觉得Nobel先生解决它的方式过于简单。《晋书》的《鸠摩罗什传》中有一段很奇特的叙述：“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障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Nobel先生说，不见于《高僧传》（也不见于《出三藏记集》）的这一情节“无疑是窜入的文字，因为要不是这样的话，下面紧接着的故事就很难圆满解释了。”我却不这样看。在《高僧传》卷二（还有《出三藏记集》卷一四）的《鸠摩罗什传》中，姚兴对鸠摩罗什说：大师聪明超悟，不应一旦辞世，法种“无嗣”，于是他强迫鸠摩罗什接受妓女十人。而鸠摩罗什从此不住僧坊，别居廨舍。Nobel先生的本意大概是既然鸠摩罗什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不当再说鸠摩罗什一旦去世而无嗣。但是，《晋书》不涉及这项矛盾。在宫女为鸠摩罗什生下两个儿子之后，姚兴指出的是，何可使如此卓越的法种“少嗣”，于是强迫鸠摩罗什接受十名妓女。这“少嗣”说的正是宫女所生二子。由此可见，《晋书》本文完全顺理成章，而我毫不怀疑二子情节已见于《晋书》所本之《鸠摩罗什传》，而上文已经说到这个本子既非《高僧传》，亦非《出三藏记集》的《鸠摩罗什传》。

那么，《高僧传》和《晋书》通过某些中间文本而常常逐字照抄，但两书又不时各自删节或缩编某某部分的这一原始的《鸠摩罗什传》，又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本子呢？当慧皎编纂《高僧传》而僧祐编纂《出三藏记集》的时候，一些类似的撰述早已出现，而它们在今日已大部分亡佚了。此外，《晋书》到了7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的时候方才编纂成书，然而我们可以断定，《晋书》在编撰列传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照抄更早的各家《晋史》提供的传文，而这些更早的各家晋史在为《晋书》所取代以后便失传了。我认为，《高僧传》《出三藏记集》《晋书》的《鸠摩罗什传》以及《姚兴载记》有关鸠摩罗什的材料所指向的、不明的共同史源，非常可能是“别传”的一种。这类别传，尽管我们今天几乎只能透过一些早期的引述来认识它们，却曾经大量存在于唐代和唐代之前。关于神异师僧佛图澄（Fo-t'ou-tcheng，或当做Fo-t'ou Tch'eng?）的传记就是这类别传之一，今天部分尚存，它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这类体裁的鲜明概念，但当时确有一些有据可查的别传。哀集大量别传题名（XIII，22—23）的《隋经籍志考证》没有举出《鸠摩罗什别传》，然而这并不等于说《鸠摩罗什别传》不存在。对于鸠摩罗什这样一位藉藉有名、一生如此起伏跌宕的人物，如果不曾有过别传才会令人分外

⑬（手稿注7bis）一方面，《出三藏记集》书中对于这“八百余人”只不过举出三位僧人，即僧肇、僧契（其中《丽》本同《晋书》，作僧略）译按：《大正藏》该处亦作“略”，以及我不知道的僧邈（也许是僧迁之误？）。但是稍后又提到作为罗什弟子与合作者的道恒、僧标（写作僧摽）、慧叡（见《丽》本，余本作僧叡）、僧敦（我不知道）、僧弼[Seng-bi]（见《高僧传》卷七《道生传》）以及僧肇。相传为僧叡所撰《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给出了一份合作者名单，众人之中有僧契、僧迁、法钦、道流、僧叡、道树、道恒的名字，此外还可以发现新出现的慧恭、宝度、慧精、道恢与道惊。

惊异^⑭。我还要推得更远一些,我很想说,今天如此向我们述说的这样一份关于鸠摩罗什的历史,恐怕主要是来自某种特定的传记,而这种传记很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吹捧外国僧人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各类传说被一股脑儿地带进来,丰富了原本可能并未充斥那么多事件的人物生平。

因此,鸠摩罗什在到达河西之前,其生平中许多可谓之为传奇的细节应当敬而远之。相传他先祖在印度世袭国相。就事论事,这不无可能,但是,自从2世纪自称安息王子的安世高以来,侧身来华佛教僧人之间的王公贵胄人数如此之多,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曾有一些汉学家从西方史料记载的早期安息人物找出安世高,其比定事实上是不可靠的,而且极其可能其原则本身就是可争议的:安世高看来并没有全部译出后来挂到他名下的那些经典。这应当归诸那些为安世高追加显赫出身的后人,而那也正是其业绩得到始料未及的渲染的时代。同样,菩提达摩(Bodhidharma)传说中也被认为是南天竺某位国王之子,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的同代人中都不理会这样一种亲缘关系^⑮。鸠摩罗什的情况也不排除多多少少与此类似。佛陀本人是国王之子;到中国宣扬其教义的大师们可以仿照教主,被配上原本无权获得的、特别高贵的出身系属。

无论如何,有关鸠摩罗什幼年的叙述显然不值一信,人们不妨针对以下几点加以判断:七岁出家,颂阿毗昙(abhidharma),自发地理解其形而上学的精微奥义;九岁,被母亲带往罽宾;稍长,但总在十二岁之前,在辩难中折服外道论师,使之哑口无言;罽宾王给予日供,寺院长老不仅派沙弥十人,而且遣“大僧”五人营视服役;十二至十三岁,到沙勒,国王隆重接待,龟兹王也遣使存问。身为著名法师的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Sūryasoma)与其兄须利耶跋陀(Sūryabhadra)一道前来师从这位青年。鸠摩罗什继而来到温宿(乌什),通过论辩,打败一位此前庄严地战败一切对手的外道大师。龟兹王躬自到温宿迎接鸠摩罗什还国。年二十,鸠摩罗什受戒于王宫。是时,卑摩罗叉(Vimalākṣa)教鸠摩罗什学小乘之说一切有部律(《十诵律》)。有顷,鸠摩罗什之母再赴天竺,告知龟兹王其国将倾。鸠摩罗什自己停住龟兹两年,学习大乘经论,名声日益远播。前秦王苻坚建都长安,领有河西一带,377年得知鸠摩罗什之名。382年,苻坚遣吕光西伐焉耆和龟兹,临行特别叮嘱,如果占领龟兹,应保证鸠摩罗什安全,并驰送鸠摩罗什到长安。龟兹被吕光攻陷,吕光班师时,把鸠摩罗什带回了中原。

先是一个孩提,后是一位少年,居然获得连成年人也难以奢望的种种荣耀,这种叙述显而易见不可凭信,无待赘述。不仅如此,这种叙述还存在着与我们从其他史料中能

⑭ (手稿注8) 唐代之前颇有不少佛家别传,其篇目为《隋经籍志考证》作者所未收,如世亲(Vasubandhu)之别传即然。关于此传,详Péri《关于世亲之年代》,353、372—373页。然而,看来Péri没有领会到那是别传而非本传。本传乃是史籍(例如朝代编年史,高僧传等)所收者,别传则是作为一篇独立著作而流传的传记作品。Péri上揭文372页提到的已佚《无着传》,看来也像是一部别传。慧立与彦棕所撰《玄奘法师传》对“别传”一词用法略有不同。这部玄奘传本身正是一部别传,但传中却将《大唐西域记》,也就是玄奘法师的回忆录称之为“别传”,参见儒莲(Julien),《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sang》,Paris, 1853, pp. 71, 83。儒莲在那两页加上一模一样的文句,应该其著作271、289页也要出现才对,但儒莲却省略了。

⑮ (手稿注9) 参见《六朝与唐代的艺术家》(Artistes des six dynasties et des T'ang)《通报》,1923年,253—261页。

够得知的情況有种种不一而足的抵牾，以下是其中数例。

尽管《出三藏记集》中的《鸠摩罗什传》与《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有密切的亲缘，常常字句雷同，但是《出三藏记集》的《鸠摩罗什传》记载的是鸠摩罗什自沙勒返回龟兹，此后他只是从佛陀耶舍（Buddhayaśas）学《十诵》，从须利耶苏摩咨禀大乘。他在龟兹停留二年，而后回到罽宾，劝化他的昔日小乘本师盘头达多（Bandhudatta）归入大乘。而在《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中情况恰好相反，是盘头达多自行来到龟兹重寻昔日弟子。然而有一项重要记载似乎表明《出三藏记集》有一部分是对的。关于鸠摩罗什的一些最好的信息是鸠摩罗什弟子僧肇撰写的各种经论后记，它为我们提供了尚未受到后续传说扭曲的资料。其中一种后记有这样的话：“什曰：……予昔在天竺国时，遍游五竺，寻讨大乘。从大师须利耶苏摩，咨禀理味。”^{①6}这段文字就其字面而言，令人推想鸠摩罗什除了罽宾还游历了印度。如果人们拘泥于《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所说的，他只是从九岁到十二岁住在罽宾，而且只是为了学习小乘，那么，上面所引的鸠摩罗什的几句话就尤其不可理解了。即便推断他第一次印度之行确有其事，后来他也必当再次到过印度，这第二次（？）的出访印度甚至在《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也不无蛛丝马迹。该传称，鸠摩罗什回到龟兹后，在龟兹居留两年，两年之后有次出行，不当成为问题。

学《十诵》一事同样可以提出异议。《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称，鸠摩罗什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就此并未提及佛陀耶舍的名字。而《出三藏记集》的《鸠摩罗什传》则称从佛陀耶舍学，不提卑摩罗叉。可是这二位皆以译经闻名，亦皆出身罽宾。据《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卑摩罗叉居留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384年吕光攻陷龟兹，卑摩罗叉避地乌缠，乌缠殆即乌菟（Uḍḍiyana）^{①7}。他在该地听说鸠摩罗什已到长安，乃在406年{到长安}与之相会。鸠摩罗什死后，也就是说413年以后，卑摩罗叉出游中国东部，从事翻译。据此，他的卒年不可能被推定在415年之前。按照中国式的计算年岁的方法，卑摩罗叉享年七十有七（周岁76岁），由此推算，他的生年最早当在339年。但是，鸠摩罗什生于344年，据称他按中国方式计算年岁，在二十岁时，也就是363年，受戒并学《十诵》。看来卑摩罗叉当时至多二十四岁，不太可能已经成为有名的经师。

据《高僧传》（卷二），佛陀耶舍是婆罗门种，周岁十二出家，但二十六岁方才受戒。其后来到沙勒，为沙勒国太子达摩弗多（Dharmaputra）所看重，留居于宫中供

①6 （手稿注10）不幸我此刻无法检得僧肇原文，只能引述Péris《关于世亲之年代》375—376页文字。{译按：即僧肇《法华翻经后记》，详《法华传记》卷二，《大正藏》五一，54页。}

①7 （手稿注11）《开元释教录》（卷三）与《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三五）诸平行文本之中，《丽》本仅云“焉”，其余三本作“乌缠”。察觉到后一种文献的沙畹推测这可能是焉耆别名（{见所撰《魏略》所见西域国名》（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通报》，1905年，565页）。但焉耆亦早已被吕光攻陷，而且就算{焉耆}常讹写为“乌耆”甚至“乌夷”（烈维曾在《“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考》341页误比定为龟兹），乌缠与焉耆对音亦不甚佳。既然8世纪巡礼僧悟空确切使用了“乌缠”此一写法来转写乌菟（Uḍḍiyana）（{见烈维、沙畹合译《悟空行记》（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 L'Itinéraire d'Ou-K'ong）（751-790）}《亚洲学报》，1895年，II，348页），我认为应该往那里去寻找卑摩罗叉避居的地方。

养。若干时间之后,鸠摩罗什来到沙勒,从佛陀耶舍受学,对他甚为尊敬。最后,鸠摩罗什随母亲返回龟兹。沙勒王死,达摩弗多嗣位。及吕光伐龟兹,龟兹王求救于沙勒王。沙勒王亲自率兵援救,留太子处理国事,委佛陀耶舍襄辅太子。沙勒援军未及到达,龟兹已经陷落(384年)。沙勒王归国,告知佛陀耶舍有关鸠摩罗什已被吕光所执的情况。十余年后,佛陀耶舍亲赴龟兹;是时鸠摩罗什已在肃州,遣信佛陀耶舍,邀之前来相会。龟兹国人执意挽留,佛陀耶舍复停留岁许,后潜逃至肃州。但是,鸠摩罗什已到长安(402年初起)。是时佛陀耶舍得知,鸠摩罗什为姚兴所逼,已经生活在脂粉群中。由于这一原因,鸠摩罗什鼓动姚兴屡屡迎请,而佛陀耶舍久久延宕,未即从命。在长安,他从事翻译,以“赤髭毘婆沙[师]”之号而遐迹驰名^⑮。413年后,佛陀耶舍返回罽宾,仍从罽宾寄经卷一卷,传给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出三藏记集》卷一四的《佛陀耶舍传》非常接近《高僧传》中的传文,但别具若干特殊的细节。鸠摩罗什在随母亲返回龟兹之前,不再只是泛泛地说成曾从佛陀耶舍受学,而是佛陀耶舍特别教过他(小乘)阿毗昙和说一切有部律(《十诵律》)。达摩弗多即位时间与吕光西征同时。佛陀耶舍之离开沙勒前往龟兹,是由于达摩弗多的去世。

《佛陀耶舍传》的资料值得相信,因为它们看来像是重述与事件同时代的某项史源^⑯。但是它们却很难与鸠摩罗什各传相调和。实际上,这是由于佛陀耶舍各传记载了佛陀耶舍曾向鸠摩罗什传授《十诵》所致。这条材料如果与《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说法不合,却与《出三藏记集》的《鸠摩罗什传》所记相符。只是后一传记,正像《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一样,断言鸠摩罗什之受《十诵》是在龟兹,而不是像《出三藏记集》中的《佛陀耶舍传》所说的那样,鸠摩罗什之受该律是在沙勒。此外,从年代学角度考察,我们也遇上了一些新的难点。佛陀耶舍两传都说,鸠摩罗什在被母亲带回龟兹之前,曾在沙勒从佛陀耶舍受学。准《鸠摩罗什传》,鸠摩罗什生于344年;355年,亦即在按照中国计算年岁方式的十二岁时,从沙勒返回龟兹,计在沙勒停留一年。355—356年,佛陀耶舍在他很晚受戒之后才来到沙勒,至少年已二十六岁。由此可见,他至晚生于330年。这样,他在401年,即鸠摩罗什已在长安的时候东游中国,他到中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老翁了。413年之后,也就是在他已经八十三岁甚至更高年岁的时候,又启程返回罽宾,这就显得十分异常了。在这里,和卑摩罗叉的情况一样,这些大师与鸠摩罗什的关系都在时间上被提前了,鸠摩罗什的早期入印度求法的经历和他后来第二次的巡行过程,被搅到一起了。至于学习《十诵》,看来,鸠摩罗什很可能先是从佛陀耶舍进修,而后中断并改从卑摩罗叉受业。然而卑摩罗叉和佛陀耶舍两

⑮ (手稿注11a)人们可以注意到这两位罽宾法师卑摩罗叉与佛陀耶舍,由于一位有蓝眼睛而另一位有红胡子,而给予中国人强烈的印象。后一种别号说明佛陀耶舍不剃髭须。

⑯ (手稿注12)《丽》本将佛陀耶舍与昙摩耶舍的汉语译名称作“齐语”。齐代乃是《出三藏记集》主体部分撰成之朝代,尽管该集直到梁代将近515年时才得以面世。然而《宋》本、《元》本、《明》本均作“秦语”。在我看来,《丽》本可能反映的是来自编纂者的学术性修订。编纂者知晓《出三藏记集》作者常使用“齐语”这种用词,可是《出三藏记集》作者却善加抄录了原始材料里所写的“秦语”。既然北秦亡于417年,西秦亡于431年,这部传记有很大的可能是抄自今日已佚之《二秦录》,而此录乃鸠摩罗什的门人及弟子之一僧叡所撰成。

人都是律学大师；两人都在中国与鸠摩罗什相会；两人均未因鸠摩罗什身处温柔乡中而有所动摇；职此之故，传统的《鸠摩罗什传》才会发生混淆。无论如何，在这里关于传授《十诵》的问题上，没有任何道理认为《高僧传》比《出三藏记集》更可凭信。

《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称，鸠摩罗什很早就驰名中国。传文中充斥着种种异象和预言，其中讲到一则377年的星象，长安的前秦之主苻坚解释为当有西域的鸠摩罗什或者是襄阳的道安入辅中国，当即派遣一名（或数名）使节相求。《出三藏记集》的《鸠摩罗什传》省略道安，也未提及遣使。这一不太真实的情节未见于《苻坚载记》。这一情节无足轻重，不被提及倒也不奇怪。相反地，有一则应当撰于379年的、来源独立的佛教文献，似乎很好地说明了龟兹的“年少”沙门鸠摩罗什业已从小乘转向大乘^{②①}。但是下文即将指出，鸠摩罗什如果确实出生在344年，那么在379年已有三十五岁，就不当特别标明他是“年少沙门”了。

在鸠摩罗什生平中，年代上确切无误的第一件事是，384年吕光攻陷龟兹的时候，鸠摩罗什遇俘。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件事，传统的《鸠摩罗什传》仍然存在若干疑点。据《高僧传》文（而不是《出三藏记集》传文），[车师]前部王和龟兹王弟在377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同来朝见苻坚，“二王”请求苻坚派兵平定西域。史书没有保存下来有关这第一次来朝的任何痕迹。这一记载有着看来不怎么符合实际的一面：此时吐鲁番地区已处在秦控制之下；人们也根本不明白龟兹王弟——按说龟兹王弟不该被称为“王”——会建议苻坚夺取他的国家^{②②}。

实际经过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381年二月，东夷和西域六十二国入朝于苻坚^{②③}。诸国使节中，有的来自天竺、康居（Sogdiana）、于阗。但是，只有《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是唯一的一份记载，指明前部王和鄯善王^{②④}——两国都是前秦的盟友——此时来朝，“再次”推动苻坚西征中亚。两王曾经介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历史文献把他们的前来朝见苻坚一事系在382年九月，其他史料也证实这一记载。据史书记载，车师“前部王”名叫弥真（也写作弥真）^{②⑤}，鄯善王名叫休密驮。然而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弥真并不是弥第，佛教若干文献明文指出，382年，车师“前部”王弥第前来朝见苻坚，陪同弥第前来的是他的国师鸠摩罗跋提（Kumārabuddhi）^{②⑥}。受了中

②①（手稿注13）参见烈维《“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考》，338—340页。译按：此即指著名之《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载《出三藏记集》卷一一。

②②（手稿注14）正是这个提到龟兹王弟的记载令人罕异。我不明白Nobel先生为何反对关于车师王的记述。

②③（手稿注15）《晋书》卷一一三、一一四及《资治通鉴》卷一〇四、一〇五所收苻坚传记载此事。Giles先生（*Biographical Dictionary*, n° 579）误将“62”之数植入383—384年吕光征战过程中。

②④（手稿注16）Nobel先生采用了来自《高丽藏》的较差写法“善善”，这里没有理由要遵从。其余三个版本都给出了正确名称。

②⑤（手稿注17）关于这个异体字，参见《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第九卷，1909年，383页，即对沙畹与魏锡（A. Vissière）两位大作的综合评论“Ed. Chavannes, ‘Un faux archéologique chinois’ (*J. A.*, mai-juin 1908, pp. 501-510, avec 4 planches); *Lettre de M. A. Vissière*, (*J. A.* nov-déc. 1908, pp. 455-465)”, *B.E.F.E.O* 9, 1909, pp. 379—387。

②⑥（手稿注18）参见南条目录，附录II，第53条，该处有所迟疑，未决定369—371年及382年孰是。Kumārabuddhi（或者Kumārabodhi？）有时作鸠摩罗佛提，有时作鸠摩罗跋提。对于另一位同名人物，参见《六朝与唐代的艺术家》239页。又，关于“佛”“跋”之互相递用，该文245、262—264页还举出了另一个例子。